

促进农村消费的措施可以有哪些？

孙文凯

摘要：对农民消费决定因素的分析可以指导促进农村需求的政策制定，本文利用微观数据对农村消费和储蓄的研究发现：收入、财富的增长直接带来消费增长；农村金融发展不但可以促进消费，还能抵抗收入风险的负面影响，减少流动性约束导致的储蓄；由于农民预防性储蓄较多，应该考虑加大农村医疗和教育补助的力度。

一、研究农民消费和储蓄的必要性

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这和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基本是等价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是根本，毋庸置疑，收入是决定消费的最重要因素，但是，收入也不是完全的和唯一的影响因素，如果能够充分认识影响农民消费的其他因素，对于全面制定启动农村需求的政策是有指导意义的。

农村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有了显著提高。但由图 1 和图 2 可见，虽然绝对收入和消费量都在增长，但城乡间的收入和消费差距变大了。从宏观数据上看，构成我国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各项中，消费所占比例长期没有上升，近几年甚至略微下降，总消费中的居民消费比例和居民消费中的农村消费比例都在下降，后者尤其显著。当然，宏观数据由于统计对象在不断变化（主要是统计对象每年都针对常住人口，而这个每年都在变化，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成为城镇常住人口，从而在统计结果上显示减少了农村总消费）和可能的统计误差缺少指导意义，但图 1 和图 2 从人均角度观察具有经济含义。虽然城乡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比由 1985 年的 1.86 增大到 2006 年的 3.0 倍，但总消费中二者比例的巨大相对变化似乎不能完全由收入差距变化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固然是农村消费占总消费比例显著下降的一个原因，但农民自身消费和消费率的变化也势必影响这个结果（图 3）。本文尝试分析农民人均消费变化影响因素，并计算各因素贡献，在促进内需的重要性被日益重视的今天，弄清楚这些问题是有价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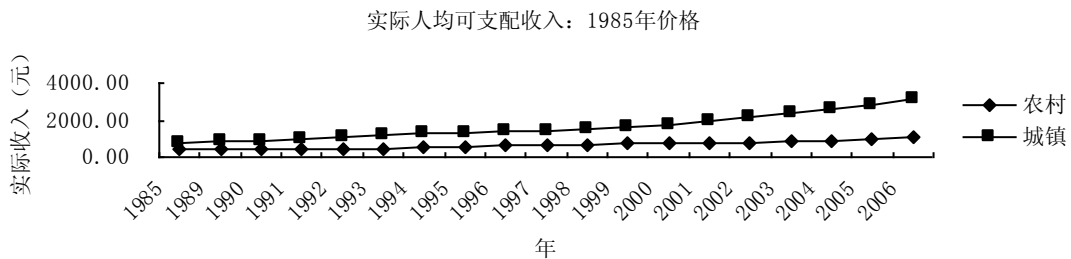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城乡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变化：1985-2006 年¹

¹ 图 1 至图 5 数据都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其中，人均实际收入为当年价格收入除以消费价格指数获得，人均实际消费是用总消费除以总人口，再除以消费价格指数获得。图 6 来自农村定点调查数据库计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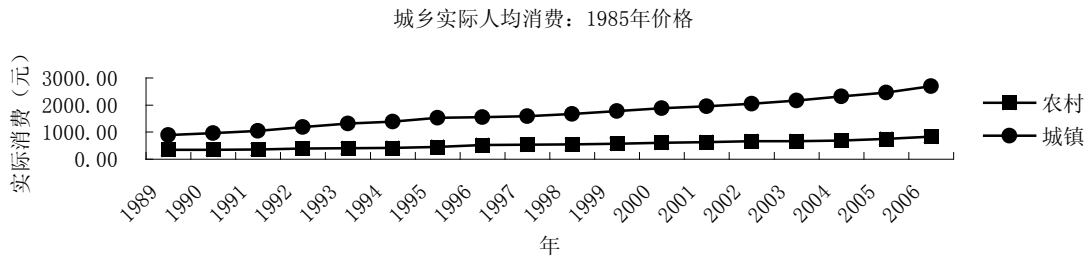


图2 我国城乡人均实际消费变化：1989-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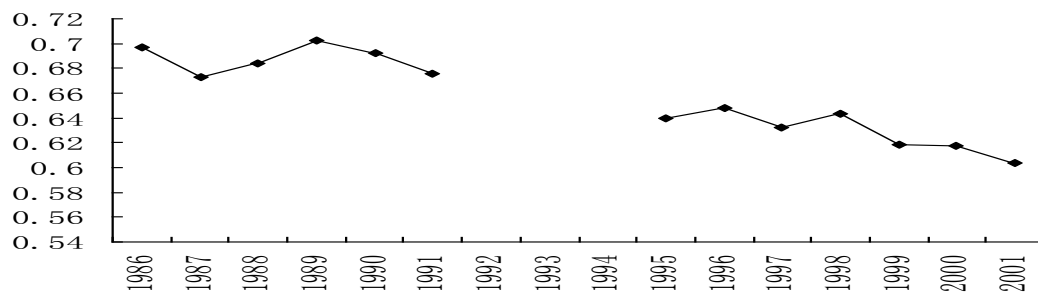


图3 农村居民消费率变化：1986-2001年

收入和消费间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金融扶持、农产品商品化和打工机会增多，农民平均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了，这放宽了当期预算约束，导致消费水平上升。另一方面，收入波动性上升了（宋铮，1999；万广华，2001；孙文凯等，2007），由于更多不确定性在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人们的绝对收入水平和相对收入水平都有很大波动。尤其在1992年后，地区间和不同人群间的年度收入差距稳定上升，同时这其中也伴随着较大的收入流动，这意味着农村居民的收入风险可能增大了。由此产生了农民消费在宏观和微观上的几个问题：短期收入和持久收入在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变化如何？他们如何影响消费？除了收入不确定性，其他影响农民消费的因素都有哪些，他们的作用如何？尤其是，金融信贷的发展如何影响消费？它本身具有何种特点？本文也尝试考察消费增长中各因素的贡献。虽然部分学者对收入不确定性对消费的影响做了研究（孙慧钧，2004；罗楚亮，2004；王芳，2006），但对农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系统性微观研究还很少，尤其是控制各个可能影响变量进行的计量分析还很少。

储蓄和消费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在很多学者研究我国居民消费率低的同时，也有很多学者研究储蓄率高的问题，实际上这两个问题是一致的。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储蓄一直创新高。一方面，这反映了经济增长带给人民财富的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储蓄太多不利于当前消费，消费不足的问题也正是当前危机下我国必须解决的问题。

关于居民储蓄行为的研究非常多，最经典的当属“生命周期假说”和“持久收入假说”。Modigliani（1969）、Gonzalez-Vega(1976,1984)针对信贷配给可能影响借款人的储蓄行为，发现信贷配给现象通过信贷约束收入进而成为储蓄的一个影响因素；Deaton(1991,1993,1997)运用动态求解手段研究预防性储蓄发现发展中国家储蓄行为的一个典型特征：储蓄不仅为了长期的财富积累，在情况变化剧烈、无法预期收入的风险环境下，储蓄同样与消费平滑相联系。国内学者对储蓄行为的研究非常多，但他们大多数从我国储蓄总量或者城镇居民储蓄的角度去研究，而很少关注农村这个庞大的整体。也有少数学者对农村居民的储蓄做出过较深入的研究，如桂又华、贾健、徐展峰（2006）通过脉冲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得出了人

均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储蓄的最重要因素等结论；李秉龙、刘丽敏（2006）研究指出收入是最重要的因素，利率、货币化程度等因素对农村居民储蓄行为有显著影响，另外，在同等外部条件下，不同农户的家庭规模、借贷数量、缴纳税费等方面的差异对农村居民储蓄行为都具有重要影响；黄健、丁岩（2008）通过城乡居民储蓄的比较分析，发现资本市场是否活跃对农村居民储蓄没有显著影响；孙凤（2001）的研究指出我国居民储蓄存在着显著的预防性动机；裴春霞（2003）从流动性约束的角度分析了储蓄行为，等等。

学者们大多倾向于运用整体宏观数据对储蓄行为作研究，而不涉及个体微观的具体行为，这主要由于农村的数据难以获得。区别于前人的研究，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与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的农村家庭入户调查。由于数据获得有限和数据特点，本文在对消费行为分析时使用了 1986-2001 年的 2000 多个定点调查农户数据；对储蓄行为进行分析时，使用 2005 年度 4000 多户农户的数据。

二、对消费量的研究假设

1992 年以前，虽然我国农村经历了改革开放后的一系列变化，包括很多全国和地方的经济政策变革，如粮食价格市场化改革，地区内部农民外出打工条件限制的放宽等，但农民收入仍主要来自农业（孙文凯等，2007），这一时期相对以后有较少的收入增长和波动。1992 年在我国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我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市场经济，并且之后跨地区的农民工大批出现。之后，农民的平均收入增长较快，波动也更加剧烈。一般认为，不确定的收入成分越高，预防性储蓄越多，消费将越少。本文基于此种观点提出假设 1 和假设 2。

假设 1：1992 年以后，农民的短期收入比重相对更高。

假设 2：短期收入占总收入比重对人均消费有负向影响。

由于农民消费受多种因素影响，其他可能显著影响消费的因素应该被控制。首先，最基本的因素有两个：收入和财富，如果收入或财富较高，将导致较高的即期消费。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假设 3：人均纯收入、人均财富都与农户人均消费正相关。

家庭人口因素可能显著影响消费，如果总人口较多，那么将有较低人均消费，如果劳动力比例较高，那么人均消费可能会由于预期的较高收入而较高。

假设 4：较高的劳动力比例带来较高人均消费。

假设 5：较大人口总量导致较少的人均消费。

此外，本文也考虑户主特征对家庭人均消费影响，如果户主是村干部（或党员），可能会有较高消费水平，如果户主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者外出打工，可能会因消费理念超前且预期收入水平高而消费水平较高，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6 和假设 7。

假设 6：户主是村干部提升人均消费水平。

假设 7：较高的户主受教育水平和外出务工都能提升当前家庭人均消费。

在应对收入波动或收入限制时，金融的发达程度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如果借贷较为自由，那么消费会较为平稳，并且预算变大会增加消费。本文依此提出假设 8。

假设 8：借贷提高人均消费。

本文还分析通货膨胀率的影响，通货膨胀率改变了人们对当前物价的感觉和未来物价的预期，对消费的影响可能有两面性，需要实证检验。

三、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联合进行的农户各年定点调查，这一调查从 1986 年开始，包含了各类农户（各种经营类型，各种收入水平，干部户和五保户等）的各

类信息（人口结构，收入，资产，经营状况，借贷等），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对消费分析的样本中包括辽宁、山东、湖北、广东、云南、甘肃六个省 1986-2001 年的数据，其中，1992、1994 两年没有调查因而数据缺少，本文主要使用连续的各年数据，这些年度包括 1986-1991 年和 1995-2001 年。所有受价格影响数据都进行了价格指数平减，并删除收入最高和最低 1% 样本，最终得到每年 2216 个数据，这是本文分析消费时的主要分析对象。

由于收集的数据是以家庭为单位，本文使用人均纯收入作为家庭收入水平的指标。消费包括生活消费（衣食住行用和燃料）、文化消费和其他非借贷性支出，在数据库中也给出了总量。财富定义为家庭拥有的所有资产的货币价值，具体内容包括现金、存款、对外投资、对外借款和固定资产原值并扣除借入款。

从下文表 3 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各个变量从均值或比例上看没有过大或过小的情况，而且很多变量在两个时期出现了较大变动，这有利于分析影响因素在两个时期的不同作用。

（二）方法说明

什么反应持久收入？在 Friedman(1957) 开创性的研究中采用了多年收入的移动平均作为持久收入的代表，类似做法的还有 Gottschalk 和 Moffitt (1994)，而 Khor 和 Pencavel (2006) 直接采用多年收入平均来反应持久收入，本文采用的方法类似后者，稍有改造，这个方法也和 Blundell 和 Preston (2005) 的方法类似。

假设农户的某年收入完全由持久收入部分和短期收入组成，持久收入反映其能力、年龄等因素带来的收入，短期收入反映了一些其他的偶发的不确定性的收入或损失。

$$y_{it} = y_{it}^P + y_{it}^T \quad (1)$$

i 代表家庭， t 代表时间， P 和 T 分别代表持久和短期收入，容易理解，持久收入随时间在变化，进一步假设持久收入有如下表达式：

$$y_{it}^P = \alpha + \mu(t) \bar{y}_i \quad (2)$$

其中 \bar{y}_i 代表多年平均收入，而 $\mu(t)$ 被假设服从以下形式：

$$\mu(t) = \mu_0 + \mu_1 T_t \quad (3)$$

T_t 代表时间趋势，这样，总收入可以分解成：

$$y_{it} = \alpha + \mu_0 \bar{y}_i + \mu_1 T_t \bar{y}_i + v_{it} \quad (4)$$

v_{it} 代表了短期收入，对于某一个确定年份 t ，持久收入和短期收入的波动可以表达为：

$$\text{var}(y_{it}^P) = \text{var}(\hat{y}_{it}^P) \quad (5)$$

$$\text{var}(y_{it}^T) = \text{var}(\hat{v}_{it}) \quad (6)$$

这样，只要预测了三个参数 α 、 μ_0 和 μ_1 ，就可以估计某年度某个农户的持久收入和短期收入并基于此计算他们的波动大小及对比。如果随着年度变化短期收入波动与持久收入波动对比变大，这也意味着整体而言农户的平均收入波动增大了。

四、持久收入与短期收入的变化

利用上文描述的方法，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三个参数进行预测，得到结果如表 1

所示。

表 1 持久-短期收入模型中的参数估计

	α	α_1	α_2
86-91	0	0.9783 (113.93)	0.0062 (3.62)
95-01	64.0961 (3.54)	0.6174 (26.66)	0.0673 (22.06)

注：括号内为 t 值，所有变量都是显著的，1986-1991 年间常数项显著为 0。

根据表 1 所作估计，带入原始模型的公式 (5) 与 (6) 中，可以计算 1986-2001 年每年持久收入波动和短期收入波动的大小及对比，如表 2 所示。

表 2 持久和短期收入波动的计算及对比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var(incP)	314.11	316.09	318.07	320.04	322.02	324.00	
var(incT)	248.40	210.86	241.17	200.97	191.22	249.03	
S(t)	1.26	1.49	1.31	1.59	1.68	1.30	
S1(t)	0.28	0.23	0.24	0.23	0.21	0.26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var(incP)	616.73	677.38	738.02	798.67	859.31	919.96	980.60
var(incT)	600.37	650.52	666.09	676.07	655.72	715.82	793.41
S(t)	1.02	1.04	1.10	1.18	1.31	1.28	1.23
S1(t)	0.61	0.56	0.53	0.51	0.50	0.50	0.52

注：S(t)= var(incP)/ var(incT), incP 代表持久收入, incT 代表短期收入, S1(t)=mean(|incT/incP|)。

由表 2 可见，相比于 1992 年以前，1995 年以后的短期收入波动相对于持久收入显著地变大了，这印证了假设 1。这也意味着 1995 年以后，农民收入不确定性相对增加了。

五、消费的影响因素

已有很多对消费的研究（孙凤，2001； Wan, 2005，等），但较少有人采用微观定点数据库系统地分析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一般地，对于面板数据（panel data），首先应该假设最一般的形式是：

$$y_{it} = \alpha_i + x_{it}\beta_i + u_{it}, \quad i = 1, \dots, n, \quad t = 1, \dots, T \quad (7)$$

此模型有三种可能的系数结构：

情形 1: $\alpha_i = \alpha_j, \beta_i = \beta_j$

情形 2: $\alpha_i \neq \alpha_j, \beta_i = \beta_j$

情形 3: $\alpha_i \neq \alpha_j, \beta_i \neq \beta_j$

情形 3 是最一般的形式，包含了前两种特例情形。由于本文的数据两个时间段各包含几年的样本，而每年又有几千个农户数据，因此如果采用情形 3，那么结果会非常多，难以罗列。即使只是根据标准参考书的过程验证情形 3 是否成立，也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因为我们只想得到平均的结论，本文大多数时候直接假设所有变量系数在每个时期内近似相同，他们的不同体现在截距上（固定效应）。也有针对不同收入阶层的细分，此时的假设是所有收入

阶层变量系数相同。即我们的模型基本采用情形 2，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验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通过 Hausman 检验，拒绝随机效应（检验的卡方值在 1% 范围内显著），本文采用带工具变量的固定效应模型。

被解释变量采用人均实际总消费支出，回归分析所使用的解释变量可归纳为五大类：

收入变量 Inc：包括人均纯（总）收入，人均财富，短期收入与持久收入比

人口变量 Pop：包括总人口，劳动力比例

户主特征 Head：包括是否村干部，是否党员，户主受教育程度

金融变量 Fin：当年借贷总额

其他变量 Other：是否外出打工，地区年度通货膨胀率

采用以下模型形式：

$$\text{Ave_lexp}_{it} = \alpha_i + \beta \text{Inc}_{it} + \delta \text{Pop}_{it} + \eta \text{Head}_{it} + \phi \text{Fin}_{it} + \gamma \text{Other}_{it} + \varepsilon_{it} \quad (8)$$

其中，i 代表农户，t 代表时间，为了区分 1992 年前后的不同，本文将整个样本分解为两部分，即 1986-1991 年和 1995-2001 年，基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3 所示。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说明

	1986		1995		变量类型	说明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人均消费	449.72	335.32	1701.55	1433.89	数值	家庭生活消费/家庭总人口
人均收入	558.13	406.75	2305.09	1803.50	数值	家庭纯收入/总人口 (现金+存款+对外投资+对外借款-借入款+固定资产原值)/总人口
人均财富	1286.92	1219.87	5091.04	6407.49	数值	短期收入/持久收入
短期收入比	-0.06	0.35	0.04	0.74	数值	短期收入/持久收入
总人口	5.06	1.77	4.51	1.62	整数	
劳动力比率	0.55	0.18	0.62	0.20	数值	劳动力数量/家庭常住人口
外出打工	0.15	0.36	0.19	0.39	哑变量	有人外出=1 否则=0
村干部	0.05	0.23	0.06	0.23	哑变量	是=1 否则=0
当年借贷总额	270.25	782.99	728.75	3310.53	数值	各种借款当年发生额之和

注：每期收入、财富、消费和借贷都折算到时段年初价格。

通过简单对人均消费占人均收入的比重计算，容易看出平均而言农民的消费率在后一时期有所下降，而人均财富和收入则明显上升。由于消费受多种因素影响，因此需要控制多个因素做多元分析。重要的是，信贷额度可能是一个随机变量而非外生变量，需要采用工具变量解决回归误差，本文采用上年末信贷总量作为工具变量，此工具变量满足与本年信贷总额相关而与收入和消费不相关。回归结果如表 4 和表 5 所示。在对教育程度影响回归分析时，采用高中及以上程度为参考变量。

(1) 短期收入比的影响

在第一时期，较高的短期收入与持久收入比显著地降低人均消费，而且在不同收入层级都得到一致的结论，尤其是对于低收入者这个负面影响更大。而在第二时期，短期收入比对消费影响不再显著。这些结论部分印证了假设 2。短期收入较高意味着收入波动较大，这会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减少消费，但如果金融信贷环境改善了，农民可以较自由借贷或储蓄以降低收入波动影响，那么这将显著减少其对消费的影响程度，对金融因素的考察证实了这一点。另外，绝对收入的增长也使得有更大能力应付波动。

表 4 人均消费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1986-1991 年

	总体	P 值	低收入	P 值	高收入	P 值
人均纯收入	0.53	0.00	0.64	0.00	0.49	0.00
人均财富	0.02	0.00	0.04	0.00	0.007	0.15
短期收入比	-80.82	0.00	-102.48	0.00	-89.80	0.00
总人口	-12.19	0.00	-6.95	0.00	-16.09	0.00
劳动力比例	6.07	0.69	-3.00	0.80	2.59	0.94
是否村干部	28.77	0.03	-11.92	0.29	56.08	0.04
是否党员	35.36	0.00	25.25	0.00	38.42	0.04
受教育程度—文盲	-10.84	0.38	3.93	0.68	-34.73	0.29
受教育程度—小学	-1.58	0.88	-2.17	0.80	-2.49	0.92
受教育程度—初中	-4.33	0.69	-5.07	0.56	-8.00	0.75
年度通胀率	0.04	0.91	0.32	0.31	-0.30	0.67
是否外出打工	5.40	0.49	-7.66	0.26	7.01	0.68
借贷额	-0.003	0.35	-0.003	0.34	-0.001	0.89
常数项	184.30	0.00	57.36	0.13	311.86	0.00
Adjusted R ²	0.34		0.17		0.20	

(2) 收入和财富的影响

观察两个时期的系数，收入对消费的影响都显著为正，但在第二时期其影响程度要小得多。总体上，财富对消费的影响为显著的正，在第一时期与第二时期的差异不大。这些结果，一方面印证了假设 3，另一方面反映了农民的消费越来越少的受限于当前收入状况。

(3) 人口因素的影响

在两个时期，家庭总人口越多，人均消费越少，尤其在第二时期，其负面影响更大。这印证了假设 5，也反映了较多的人口始终是困扰农村居民福利水平提升的重要障碍，在收入增幅不大的情况下，这个因素格外显著。而劳动力比例并不能显著提升人均消费，假设 4 不被支持。

(4) 户主特征因素的影响

在第一时期，总体上，户主是村干部和党员都显著提升了消费水平，对高收入者比较明显，在第二时期这个因素影响不大，这部分印证了假设 6。在第一时期，受教育程度对消费并无明显影响，而在第二时期，教育程度与人均消费水平呈现一个 U 型的关系。

表 5 人均消费影响因素的估计结果：1995-2001 年

	总体	P 值	低收入	P 值	高收入	P 值
人均纯收入	0.36	0.00	0.40	0.00	0.29	0.00
人均财富	0.02	0.00	0.05	0.00	0.002	0.64
短期收入比	26.37	0.18	2.19	0.89	29.72	0.59
总人口	-61.25	0.00	-66.16	0.00	-141.23	0.00
劳动力比例	-90.95	0.13	-49.56	0.53	96.51	0.63
是否村干部	91.01	0.11	19.12	0.80	-177.82	0.43
是否党员	-40.11	0.30	57.68	0.31	126.74	0.48
受教育程度—文盲	-62.33	0.34	3.58	0.97	82.10	0.80
受教育程度—小学	-77.05	0.10	24.79	0.72	-493.52	0.02
受教育程度—初中	-121.20	0.01	-121.93	0.08	-642.91	0.00
年度通胀率	2.36	0.11	6.88	0.00	-10.39	0.01

是否外出打工	-53.42	0.09	12.70	0.72	-18.32	0.86
信贷额	0.38	0.00	0.47	0.00	0.40	0.00
常数项	822.54	0.00	301.79	0.08	3299.86	0.00
Adjusted R ²	0.34		0.21		0.19	

(5) 金融因素影响

可借贷资金在第二时期显著提高了消费水平，而在第一时期不明显，这比较符合预期。并且，低收入者的借贷消费弹性更大。

(6) 其他因素的影响

在两个时期，外出打工并没有提高消费水平，但这和消费的定义有关，由于调查数据中的消费只统计家庭在当地的消费，外出务工人员的消费未列入其中，以总人口减去外出务工人员后，发现新的外出务工显著提高了本地消费，并且第二阶段更高。当然，对外出务工这一因素的影响大小很难确认，因为不知道外出务工的具体时间，可以想象的是，由于外出务工提高了家庭纯收入，可以提高留在当地人的消费水平。通货膨胀在第一时期是不显著的影响，而在第二时期则有分化，对于低收入者，它促进了消费，对于高收入者，通胀显著降低了消费。

六、对消费计量分析的意义

计量分析的结果大部分符合预测，也展示了农村消费的变化过程。在改革开放后的较早时期，由于市场欠发达、信贷不充分，农民消费受到的影响因素主要为即期收入水平，而且由于防范风险的手段欠缺，收入波动将导致更多预防性储蓄从而减少消费。到了后期，这种状况改善了许多，虽然农民收入不确定性增大了，但应对措施也更多了。整体上，绝对收入的增长和信贷额度的可获得性提高，都使得收入波动的负面影响并不如之前的大。在收入水平提高有限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更显著地减少了消费。

根据上文计量分析得到的显著因素，可以写出两个时期的消费方程。根据每期的消费方程，可以计算各因素在对应时期的变化导致人均消费额的变化，其中主要的影响因素影响方向及比例列在表 6 中。

表 6 影响消费总量的各因素贡献值估算 单位：%

		收入	财富	人口	波动	身份	教育	务工	借贷
第一时期	影响方向	+	+	+	-	-			
	绝对比重	77.36	9.80	6.20	5.68	0.96			
第二时期	影响方向	+	+	+			+	+	-
	绝对比重	42.85	22.93	7.89			1.58	0.64	24.10

根据表 6 的计算可见，随着时间推移，不只是消费的影响因素发生了变动，而且在影响消费增量的构成比例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地说，纯收入影响消费总量的比例显著下降了，而财富和信贷量对消费的影响显著提高。需要注意的是，信贷量的影响方向为负，即在 1995-2001 年这段时间，虽然借贷能够促进消费，其弹性甚至超过纯收入的影响，但由于借贷额度下降了，对农户消费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这是第二时期消费增量不大的重要原因。

七、影响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的因素分析

储蓄——作为消费的相对面，同消费一样，成为西方经济理论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一直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与青睐。储蓄的作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适度的储蓄规模可以为资金市场提供流动性，使企业能够获得信贷，促进长期发展，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索罗模型——将储蓄作为经济增加的动力；另一方面，过高的储蓄意味着资金流出消费市场，居

民消费意愿不足，导致市场消费需求低下，企业盈利艰难，从而使得劳动者收入减少，消费继续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一国经济的发展。从世界范围看，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验，都经历了由储蓄型向消费性经济的国度，这很容易理解：当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时候，政府很难提供足够的公共品服务，如养老、医疗等方面满足国民需要，同时，由于预期未来收入也不够高，人们将多储蓄以预防未来不确定性支出，这样的作用是增加了储蓄和投资，从宏观上促进了经济增长速度；而生产力水平比较高的阶段，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由于收入足够高，国家提供的公共品也使得人们未来的风险较低，这样，高消费、低储蓄就很自然地发展起来。同样作为东亚国家，日本的消费率虽然比美国低，但远高于中国。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开始高速发展，GDP 以平均每年 9.83% 的速度快速增长，同时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开始攀升。Modigliani (2004) 根据调查统计，发现 70 年代是中国居民储蓄的分水岭：建国至 70 年代中期，中国居民储蓄率不超过 5%，但 70 年代中期后，经济的增长使其迅速跃升至 34%。高储蓄率被认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但当前较低的消费水平又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无论如何，研究中国的消费和储蓄行为对于认识中国现状是有意义的。

已有的研究或政策分析结果表明：收入、预期收入、预防性储蓄以及流动性约束是目前农村居民储蓄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分散见于各种学术期刊、政府报告以及报纸文章。并且，多数都是采用宏观数据作的简单统计，使用宏观数据的问题在于，很多变量，如收入与储蓄间存在内生性，使得估计系数有偏。而运用微观数据则能很大程度上消除变量内生性问题，正是基于这些优点，笔者选择微观数据对微观个体进行分析。另外，此前学者的分析大多基于控制变量而重点考察某一类变量的影响。但笔者认为，要全面、真实、准确反映事实，需要综合考虑各个因素，否则，只针对某一类影响因素的统计可能会带来又偏误的结论，比如，如果只考虑收入对储蓄的作用，可能会将与收入显著相关的其他因素如收入风险等对储蓄的作用考虑到收入的影响中，从而夸大了收入的作用。因此，本文并不局限于验证某一种储蓄理论的正确性，而是综合各种因素，系统地反映现实问题。

本文采用 2005 年新增储蓄为被解释变量，从收入、上年末储蓄余额、预防性约束（包括家庭收入风险与未来支出风险）、融资便利性（流动性约束）、户主特征、改善性需求等因素作解释变量。本文被解释变量选择广义的新增储蓄（即新增存款+新增现金+新增借出款—新增借入款+新增对外投资）。解释变量的可能作用解释如下：

(1) 收入：容易理解，收入越高，储蓄额度可能越大。

(2) 上年末储蓄余额：家庭在一年需要增加多少储蓄，与上一年的储蓄存量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当家庭储蓄存量已经足够大、拥有足够的抗风险（包括收入风险、融资风险、支出风险等）能力时，家庭面临风险的边际冲击效应就相对较小，就不需要在新的一年里存入更多的储蓄。

(3) 家庭收入风险：农村家庭的经营类型对一个家庭的收入以及储蓄具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寒冷、干旱、虫害等自然灾害对所有农业经营者来说是系统性风险，因此，在本文主要探讨非系统性风险影响的前提下，系统性风险不作考虑。农村家庭的非系统性风险主要体现在经营主业的差异上。一般而言，由于从事商业的经营波动性较大，家庭主业为商业或私营企业的农村家庭为防止企业倒闭，会积蓄更多的资金。

(4) 未来可能支出：由于农村大多处在偏远的山区、内陆位置，经济条件比较落后，面临的资金冲击风险也就较大。为了抵御这些可预期风险，农村居民会在风险发生前做足够的准备，以缓解风险到来时对整个家庭的巨大冲击。预防性动机成为农村居民储蓄的重大影响部分。农村家庭面临的支出风险主要有未来教育支出、养老支出、医疗费用支出、儿子结婚费用支出等。

(5) 流动性约束：融资便利性就成为当今农村家庭储蓄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未

来预期可以借到的资金较多，足以抵御风险，那么家庭在即期就不需要增加较多的储蓄，反之，如果预期可融通的流动性狭隘甚至中断，那么家庭就应该在即期储备更多的资金以抗衡风险。

(6) 户主特征：农村崇尚“一家之主”的传统家族主义。任何家庭决策都要经过户主的“审批”才能最终通过。因此，对于储蓄这个家庭重要问题，户主特征就显得举足轻重了。户主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具有专业职称、是否国家干部等一系列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家庭的储蓄决定。

(7) 改善性需求：在农村，除了教育、医疗、防老、婚丧嫁娶外，住房就成为最后一个农村的“高消费”。家庭的住房条件如何、是否需要改善，都影响着家庭的储蓄决定。如果人均居住面积较小、住房条件较落后，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大以及结婚用房的需要，家庭的改善性需求就越强，家庭就越有意愿通过积蓄以改善居住条件。因此，新增储蓄与改善性需求呈正相关关系。

以上总结了影响农村居民储蓄的可能因素。下面，本文采用由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农业部与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对我国河北等 19 个省份共 4788 户农村家庭 2004-2006 三年的统计数据实证分析，探讨分析影响微观个体储蓄的具体因素，希望可以为政策建议有所帮助。

对于变量的选择，笔者经过各个因素多个替代变量的回归进行选择，以寻找最具有解释力度的解释变量。变量说明如下：

表 7 变量说明表

变量	说明 (货币变量单位均为元)
被解释变量	sav 数值型变量，05 年新增储蓄=新增年末存款+新增现金+新增借出款-新增借入款+新增对外投资
解释变量	
衡量收入	inc 数值型变量，05 年家庭全年纯收入
衡量上年储蓄余额	sav04 数值型变量，04 年末广义储蓄余额
衡量预防性约束	
家庭收入风险	com 虚拟变量，=1，家庭经营主业为商业；=0，其他
未来教育支出	dzxs 虚拟变量，=1，成员有 0~18 岁在校生；=0，没有
未来养老支出	old_protect 虚拟变量，=1，户主年龄是 50~65 岁；=0，不是
未来医疗支出	hos06 数值型变量，06 年家庭医疗费用支出
未婚男性支出	merry 虚拟变量，=1，成员有 22~28 岁适婚未婚男性；=0，没有
衡量融资便利性	debt06 数值型变量，06 年家庭全年累计借入款
户主特征	
干部户	official 虚拟变量，=1，户主为干部（包括村干部与国家干部）；=0，不是
性别	sex 虚拟变量，=1，男；=0，女
专业职称	pro 虚拟变量，=1，户主有专业职称；=0，没有
受教育年限	edu 数值型变量，户主受教育年限
衡量改善性需求	ehsq04 数值型变量，04 年末人均住房面积
交叉变量	
	sav_merry =sav204*merry
	hou_merry =ehsq04*merry

表 8 简单描述了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由表 8 可以看出，纯收入、户主教育程度、未来医疗费用与新增储蓄呈正相关关系，而上年储蓄存量、融资便利性、上年末人均住房面积等与被解释变量负相关，所有系数符号符合前述假设。但是，由于简单相关系数不能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还需要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表 8 数值型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关系数

	inc	sav04	debt06	edu	ehsq04	sav_merry	hou_merry	hos06
sav	0.192	-0.233	-0.104	0.044	-0.018	0.009	0.071	0.029

由于我们采用了截面数据，可以直接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作回归分析，在分析过程中，也加入了一些交叉项的影响，结果如表 9 所示。

表 9 WLS 回归结果

inc	sav204	com	dzxs	old_protect	hos06
0.418209 (61.01)***	-0.1306 (-30.86)***	714.079 (2.26)**	409.5477 (3.48)***	538.0372 (4.87)***	0.181517 (4.01)***
merry	debt06	official	sex	pro	edu
518.0995 (1.74)*	-0.2003 (-14.25)***	1142.205 (5.30)***	-966.737 (-4.99)***	-1660.54 (-6.99)***	426.4046 (17.84)***
ehsq04	sav_merry	hou_merry	C	Adjust R2	F
-19.0423 (-7.95)***	-0.06736 (-6.74)***	45.71293 (5.97)***	-3072.25 (-13.00)***	0.4984	316.63 ***

从表 9 可以看到：

(1) 收入是影响储蓄的重要变量，农民的边际储蓄倾向很高，但如果之前存款较多，那么新增存款的动力就小得多，这意味着存款有一个上限，超过这个限度，农民将增加消费而减少储蓄。

(2) 无论是家庭收入风险还是未来支出风险，农村家庭为抵御这些风险都增加储蓄。其中，家庭经营主业的影响作用为 714.08 元，即一个经商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家庭会为了防御经营的危机会比从事如农业、林业等家庭平均多储蓄 714.08 元。农民的预防性支出也很多，拥有小于 18 岁在读学生的家庭为了未来孩子的教育费用会比没有在读学生的家庭多储蓄 409.55 元；户主年龄在 50-65 岁段的家庭会为了以后的养老支出而现在多储蓄 538.03 元；未来医疗费用对储蓄的边际影响是 0.18，即若未来需要 1 元的医疗费用，家庭会在现时多储蓄 0.18 元，以防风险。一个有趣的发现是，为适婚未婚儿子而储蓄的动机也较强烈，农户会在现时为儿子未来巨额的开销而选择多储蓄，比没有“婚姻动机”的家庭多储蓄 518.09 元。从绝对数来看，多个预防性储蓄因素影响中，经营的防御动机最强，养老动机次之，婚姻动机、教育动机紧接其后。总体上说，预防性约束显著地影响了农村居民的储蓄行为。

(3) 如果农村居民预计能在资金市场上借到 1 元，那么他的家庭现时将会少储蓄 0.2 元。反之，如果他没有借到钱，那么他将会为流动性动机现在多储蓄 0.2 元。流动性对农村居民储蓄确实有约束的影响。

(4) 户主的“一家之主”也发挥显著。身兼干部一职的户主会多储蓄 1142 元，原因可能是支出的不确定因素(如应酬支出等)真多；女户主会更倾向于主导家庭储蓄，男户主更倾向于主导家庭消费，这也说明农村家庭女性要比男性更有谨慎性，不易乱花钱，二者差距为 966.74 元；具有专业技术职称户主的家庭比没有职称户主的家庭会多消费多达 1660 元；户主受教育水平越高，家庭的储蓄也会越多。

(5) 改善性需求作用显著且边际效应极大, 上年人均住房面积每多 1 平方米, 今年家庭的新增储蓄将会减少 1904 元。

(6) 两个交叉变量反映了储蓄动机的复杂作用。交叉变量 sav_merry 反映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 上年末储蓄与结婚储蓄动机的交叉影响。在有储蓄动机的家庭中, 上年末储蓄存量对新增储蓄的边际影响就不仅是一 0.13, 而是一 0.13—0.07=-0.2。结婚储蓄动机加大了上年储蓄存量的负相关作用。交叉变量 hou_merry 反映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上年人均住房面积与结婚动机的交叉影响对新增的作用系数为 45.71, 原因可能是拥有住房面积较大的父母为儿子娶妻而欲储蓄增建更大的房子。

从以上分析, 我们已经了解到当前影响中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的因素。如何通过政策的实施而去改变中国当前高储蓄、低消费的困境, 而又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呢? 基于本研究, 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一) 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中国农村居民具有强烈的预防性储蓄动机, 基于谨慎性, 居民为抵御各种未来可能支出进行了大量的储蓄, 这也是当今中国储蓄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解决此问题之根本在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 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等, 为农村居民的将来可能发生的支出风险提供现时可确定的保障, 增加居民对消费的安全感以及信心。但是, 必须强调, 政策的落实需要得到有效保证, 政府必须加大力度审查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情况, 加强与村民的直接对话沟通, 了解村民之所需, 提高农村居民消费的积极性, 鼓励村民多消费, 带动当地企业,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 加快建立和完善教育基金及放宽大学贷款

具有强烈利他主义的传统农村居民,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盼使他们倾其财产也要让子女受良好教育, 未来过上好生活。针对这种现象, 政府可以建立教育基金, 从富裕地区募集资金, 以援助贫困村民子女面临的上学难问题, 缓解村民的家庭负担。虽然目前也有类似的“希望工程”、“青少年发展基金”, 但对于中国如此庞大的农村人口来说, 还是相对不足的。放宽大学贷款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这个问题, 并且, 要讲这个信息明确传达下去, 农民放心, 则会一定程度减少教育上的预防储蓄。

(三) 加强精神建设, 鼓励男女均衡协调发展

上述分析反映了目前农村强烈的结婚储蓄问题, 其根本原因除了婚礼的隆重外, 也跟当前中国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有关。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 2008 年乡村男女比例为 123:100, 远高于 103~107 的正常水平, 超过一成的 90 后男生找不到另一半。正是由于儿子难找妻子, 于是父母倾向于多储蓄、多“过礼”、优裕家境等条件以吸引女性。解决这个难题是一个长期的工作, 但是具有必要性。政府应当不断加强有关“重男轻女”的法律法规建设, 甚至采用经济补偿手段, 鼓励男女均衡协调发展。

(四) 放宽民间信贷, 加强民间信贷管理, 提供更多有效的融资渠道

一方面, 政府要加强与正规金融机构的沟通, 发展民间的正规金融公司, 给予适当的补贴与保障(如成立贷款担保公司), 鼓励其放宽对农村的贷款, 提供农村居民融资的便利性。这样, 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流动性约束, 促进当期消费。

八、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微观定点数据, 对农民不同时期消费和储蓄行为进行了分析。由于消费直接反映着福利水平, 对他的分析比对收入分析更有意义。分析结果发现, 收入、财富、人口规模、教育水平、信贷额度等因素都显著影响消费量。据此, 有理由相信政府各项提高农民收入的措施对提高农民消费是有显著效果的。同时, 要提高农民的消费水平, 在提高农民收入和财

富之外,应该控制人口、促进教育和务工机会,尤其要推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育。本文发现,信贷能够很好地抵制收入风险,并且其带来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由于社会条件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有理由相信本文对 1995-2001 年的影响因素分析适用于之后的阶段,并且由于农村金融状况在好转,信贷在农村居民消费中的贡献应该越来越大。即便如此,农村中的金融约束仍然可能是显著的。已有金融统计年鉴等资料统计了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在农业中贷款余额,这些统计没有对民间借贷的观察,是很不全面的。民间借贷的额度,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正规金融信贷约束的程度。根据农村定点调查数据库统计,农民的借贷来源主要包括五个主体:银行,信用社,合作基金,私人和其他,私人借贷始终占据一个显著的比例,作用不容忽视。根据一些调查(如汇丰银行调查报告,2007;朱喜,2006)发现,民间借贷的利息普遍非常高。在此条件下,定点观察数据库现实民间借贷额度占总借贷额比例在 2006 年仍高达 58.75%(合作基金、私人与其他之和),这个状况意味着正规金融目前仍难以覆盖大部分需求,也意味着农村较高的信贷约束。

对 2006 年储蓄的研究发现,预防性储蓄、改善性需求储蓄以及流动性约束显著影响着储蓄,在我国,这些方面农村确实存在着严重问题。

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直观的政策结论,即增加农民收入、培育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基金建设。

参考文献

- [1]. 桂又华、贾健、徐展峰. 农村居民储蓄模型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2006(5).
- [2]. 黄健、丁岩.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影响因素的比较研究[J].《统计与咨询》2008(3).
- [3]. 李秉龙、刘丽敏.中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经济.2006(3).
- [4]. 李焰.中国农村居民储蓄行为分析[M].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9 年.
- [5]. 罗楚亮. 经济转轨、不确定性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J].经济研究,2004(4):100-106.
- [6]. 余彩艳、朱强.我国农村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7(35).
- [7]. 宋铮. 中国居民储蓄行为研究[J].金融研究,1999(6):46-51.
- [8]. 孙凤. 预防性储蓄理论与中国居民消费行为[J].南开经济研究,2001(1):54-58.
- [9]. 孙慧钧. 我国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04(11):79-82.
- [10].孙文凯、路江涌、白重恩. 我国农村收入流动分析[J], 经济研究,2007(8):43-56.
- [11].万广华、史清华、汤树梅.转型经济中农户储蓄行为中国农村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 2003(5).
- [12].万广华、张茵、牛建高.流动性约束,不确定性与中国居民消费[J].经济研究,2001(11):35-45.
- [13].王芳. 不确定性因素对我国农村居民现金消费支出的影响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6(4):379-385.
- [14].朱福星.农村居民储蓄与“三农”问题[J]. 热点聚焦.2004(5).
- [15].Friedman, M. 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16].Gottschalk P., Moffitt R. The Growth of Earnings Instability in the US Labor Market,[J]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994(2), 217~72.
- [17].Guanghai WAN, Convergence in Food Consumption in Rural Chin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Survey Dat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05(16): 90~ 102.
- [18].Niny Khor, John Pencavel, Income Mobility of Individual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2006, 14 (3):417~458.
- [19].Richard Blundell, Ian Preston, Consumption Inequality and Income Uncertain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13(2): 603~640.